

丁公琐忆

拓晓堂

丁瑜先生，我常称丁先生。“丁公”一称，是卅年前丁瑜、沈燮元二先生同在国图编纂“全国善本书总目”时，尝有与二位先生小酌，一杯二锅头，一把花生米，斟酒闲话，沈先生称丁瑜先生为“丁公”，我亦随之有称。丁公与郑振铎、谢国祯等古籍善本鉴藏界前辈类同，嗜好小酒，沈燮元先生亦有此好，皆量窄，不误事。饮酒之人，一斗可醉，一石也可不醉，全在所遇也，丁公酒后脸红，沈先生酒后话多，不求醉意，只求谈书论人痛快。我觉得历史上的公侯伯子男爵位，“公”是一方雄霸的代言词，以丁公现在的成就，曾任北京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组长，善本特藏部部长，善本部副主任，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、文化部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兼古籍组召集人，为上赞誉，当成中国古籍善本整理鉴定行业的一方霸主，故称“丁公”，实不为过，更觉得合适。

丁公谦恭，人皆知。我在大学读书时，主修近代史，尤为关注学术渊源和流派。以我的了解，丁公在北大读书期间，曾选修赵万里先生的有关古籍版本目录文献学方面的课（参见《延年集》），是赵万里先生的嫡传学生。1949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时，恰逢王重民先生招收图书馆研究生班，丁公跻身其中，成为王重民先生的嫡传弟子。依此学术渊源和流派，丁公可谓继承王重民先生一系，又兼承赵万里一门衣钵，可谓集两大流派之成就者。王重民先生的古籍版本目录的抗鼎之作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在1983年出版时，后面有《补遗》部分一百余种，乃丁公参与完成的，观其体例笔法，深得王重民先生的真传（参见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陈绍业、丁瑜《补遗附记》）。

我与丁公相识卅年，同事八载，深悉丁公宽仁厚德，为人谦逊，不求功名。作为后学，丁公的帮助，实难罄述。在国图工作时，丁公与冀淑英先生是善本部里资历最老的专家，经历和知晓的事多，因此每遇到一些工作和学术问题，免不了要常请教，丁公总是尽其所知解答，甚至是提携。论年龄，丁公是我的父辈，

对我可以说是忘年。1987年我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，在文津街老馆，那时丁先生已经在白石桥新馆的全国总目办公室上班，行政隶属善本部善本组。丁公偶尔到老馆办事，匆匆一过，且当时搬迁工作繁忙，并没有细微接触。二十世纪80年代末，善本部全部搬迁到白石桥新馆，那时我已经负责善本组工作，曾遇到一件事，令我和丁公的关系极近。时丁公患病，住入与国家图书馆有医疗关系的北医附属医院。一日我忽接丁公电话，说他快要死了。我闻听大惊，问道：何出此言？丁先生备述急发病苦，称北医不是专科，治疗非擅长。我问道：哪里是擅长的医院，何不转院治疗？丁先生说：北京某医院是肛肠专科，但与国家图书馆没有医疗关系，不能转院。我一听就急了，放下电话，就去找馆医疗室、又去找馆长办公室。均以不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来答复，想来丁公已经找过，毫无办法了。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，那时的制度很死板，随意转院治疗财务报销都是大问题，更何况从北医转出到一家区级医院，那真是怪事。最后我就直接找馆长说明此事。不久就接到馆办的消息说，经多方协调医疗关系，同意转院治疗。丁公转院后，专科治疗对路，很快就康复了。丁公出院上班后，找我谢活人之恩。我说：那是您福大命大，天不绝人！此后，丁公对我是格外关照。丁公向来处事极为谨慎，对我的关照也是多在学术和工作，外人不察而已。令我有感的是丁公从不以地位学问教训人，拿捏分寸，从不言极，凡事都是点到为止。当然点的都很到位，能有所悟与否，那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。我就受到丁公的诸多点拨和帮助，多有感触。

丁公年轻时也曾是文艺青年，喜欢新诗，老年后又喜欢赋诗填词。丁公晚年的一些文章，叙事文笔行云流水，殊不知丁公文宗张中行前辈。二十世纪90年代后，我也陆续写了一些藏书家和藏书楼的故事，丁公曾评论过文风格调，并谈起国内名家散文，犹看重张中行先生。我学识粗陋，一时不解丁公之言。此后不久我见到张先生的散文集《桑榆琐话》，购回细读，亦为之感动。张中行是著名学者、哲学家、散文家。主要从事语文、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。治学严谨，博学多识，造诣深厚，号称二十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，与季羨林、金克木合称“燕园三老”。季羨林先生称赞他为“高人、逸人、至人、超人。”张先生的

文笔流畅，内见国学功底，且有血有肉，没有那些唧唧歪歪，多愁善感的呻吟。一句话概括，有料，读来真是一种享受。张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，在北大文学院授课。1946年离开北大文学院，丁公此时正在北大中文系，应是张中行先生的门生。张中行先生终生为文以“忠于写作，不宜写者不写，写则以真面目对人，”语言平实、功力深厚，毫无虚华的笔调，我也十分爱慕，因此多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写作风格。

对于我工作的专业知识，丁公也非常关注。上大学我读的是历史系。关于版本、目录、校勘辑佚等知识只在读研究生期间上过必修课，但毕竟不是古典文献专业，因此基础薄弱。丁公曾送我他点校出版的《读书敏求记》，并未多说和指点，只是让我读了多提意见。书送了，读不读，如何读，以及有何感受和收获，那就看读书人自己的造化了。我读此书之后，知丁公的专业水准非同一般，重要的是从中非常获益。尤其是钱曾的注释具有非常明显的欣赏性和故事性，让我领略到常熟明清之际古籍善本鉴赏一派的奥妙。古籍版本目录书通常都是干巴巴，没有情趣，但是看了此书，令人眼前一亮，原来古籍版本目录书籍也可以写的这么好看，这对我启发很大，粗略领悟了古籍善本的鉴赏玩法。

对于我的工作，丁公给我的指点更是不胜枚举。丁公从1950年后就在国图善本部任职，对库中之物了如指掌。二十世纪80年代末，国图善本部从文津街老馆搬迁到白石桥新馆，我负责老馆藏品的起运工作。当时库里除了正式编目的善本书，包括敦煌经卷、四库全书等有目录和账本登记的之外，还有一些未编的文献图书资料。我记得其中有两宗未有登记的文献就得益于丁公的指点，一是柏林寺武林藏、一是翁氏文献资料。那是在四库全书装箱搬迁后，继而搬运四库书架。我当时在库里监督搬运工包装四库书架，这都是原来避暑山庄文津阁原装书架，亦属文物，需十分小心。不想突然在放倒的书架顶上散落下来一大堆书籍，很是诧异。高大的四库书架，两米多高，通常看不到架顶上有何物。上去查看，乱七八糟，全无系统，什么都有，有明代奏折、清末刻本以及铅印本等。我仔细观察之后发现，许多内容大都与常熟翁同龢以及戊戌变法有关。于是问组里的同事，无人知晓这些资料的来路。后来请教丁公，告知那些书架的位置，是当年赵

万里先生在库房的办公桌所在，这些资料或许是二十世纪 50 年代赵先生从常熟将翁氏捐赠古籍善本，连同家中的纸质资料一并拉回国图，经整理之后，善本古籍列入正编，其他资料不入正编，就暂置于办公桌附近的四库书架顶上。问明此节后，遂将这批资料安排傅敏先生登记造册，运至新馆。另一批是一批藏经，直到搬迁之时仍没有登记。我请教丁公，云这些是文革期间，北京柏林寺红卫兵破四旧，捣毁佛龕，从佛肚子里出来的东西，即世称所谓“装藏”，随着国图从柏林寺退出，这批藏经运至国图善本库中收藏。这批藏经丁公曾第一时间鉴定和整理，由于产权不清，故没有登录入册。丁公告诉我，这是一部很奇怪的藏经，怀疑是史料中有记载，而世间未见的武林藏，值得仔细整理和研究。这事我铭记在心，于是请傅敏先生登记造册。由于搬迁工作任务繁重，一时没有组织人员整理。搬到新馆后，方广錡先生调到国图善本部，他问我库里可以整理研究的项目时，我将这部藏经的情况告知。后来由方先生主持，傅敏先生具体工作，整理后认为是磧砂藏。

我离开国家图书馆后，入嘉德主事古籍拍卖，丁公也曾给予多方关照，鼎力相助，每遇疑难古籍版本问题之时，多有就教。说实话那时我能从国图请得动的专家也就是丁公一人。如宋蜀刻中字群经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毛氏汲古阁抄本《陶渊明集》等重要拍卖品，都请丁公过目鉴定。此外丁公还为我介绍并推荐了宋刻本《春秋经传》清宫天禄琳琅旧藏。记得最重要的一次是 1995 年得到陈澄中旧藏的宋周必大刻本《文苑英华》，宋宫旧藏。我因参与撰写上海古籍出版社蜀刻唐人集的《丁卯集》和《权德舆集》的跋，此两本曾经都是民国著名藏书家陈澄中旧藏，为此我专门请教丁公。二十世纪 60 年代，丁公当时正是善本组负责人，曾经亲历国家第二次购买海外陈澄中藏书事，涉知此事者，今已世无几人了，所谓硕果仅存。丁公讲起此事滔滔不绝，得意洋洋，我受益匪浅。1995 年秋我从香港征集得宋周必大刻本《文苑英华》，此书亦为藏书家陈澄中旧物。为此我还专门邀请丁公撰写了《宋板〈文苑英华〉回归记》一文，并推荐给新加坡报刊发表。这篇文章已经收入到丁公的《延年集》中。丁公对我所言只是版本和学术价值问题，对于购藏之事，不多言半句。直到很多年以后，我才从网上看到

了一篇文章《大道至简上善若水》，介绍丁先生几十年的往事，文中说道：“1995年某拍卖公司上拍一册宋版《文苑英华》，起价100万元，上拍之前请丁瑜先生鉴定。他认为，此宋版书与北图旧藏为同书散出之本，应参拍竞购，而最终此书被印尼人以140万新加坡元拍走”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丁公曾主张国家参与竞拍之事。这本国宝级的善本，丁公在文章中深切的说道：“此次嘉德公司从海外征集的23种陈澄中藏书，就是他当年携港之剩余部分，内中宋元佳刻、黄跋毛钞居其大半，均为罕见珍本。惟望这批善本，勿若《文苑英华》昙花一现，而能留之乡梓，此乃国家文化学术之福祉也”。而此书后来为海外的收藏家购去，至今未归，不能不说是丁公心头的一件憾事。另外，2000年关于《出师颂》拍卖，曾引起一场风波，我也深陷争议之中。事实上关于《出师颂》的鉴定过程，先是故宫组织了鉴定会，之后北京市文物局再次组织了鉴定。组织鉴定之后，闭门讨论的结果我不得知。但丁公事后专门找到我，谈论他的鉴定意见，认为是隋人书比较稳妥。现在回过头来想想，丁公当时的点拨，真是高人那！

丁公是老一代版本专家，很早就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，随身常携带的小笔记本，上面记录随机所遇的古籍善本书，包括书名、卷数、行款等文献版本信息，密密麻麻，十分详细，积数十年来定有不少册。除了有关古籍善本经眼的内容之外，里面一定也记录着相关的人和事，无疑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和学术心得的记录。如果能将这份笔记整理出来，可能更有文献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。丁公常对我说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，可惜晓堂愚顽，中庸之人，教亦学不来也。笔记也是碰到一批重要文献时偶尔一为之，完全不成系统。当然也有一些不好谈论的原因，不想留给后人。

丁公为大师，持躬耿介，一志专心，不为物迁，终生服务于国家图书馆，从事古籍采访编目、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，不仅为国家图书馆采进接收大量珍贵古籍，而且撰写并参与编纂《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》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《中华再造善本》，为后学留下了诸多宝贵经验和知识。世称德艺周厚，则名必善焉，而上士忘名，忘名者，体道合德，享鬼神之福佑，天假丁公九五之寿，皆缘善庆。公之功德，泽被后学，晚生楷模，是为不朽矣。